

广选新注集评

全宋词

1

全宋词 ①

广选·新注·集评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主编 马兴荣 刘乃昌 刘继才

第一卷撰写人员分工

王延梯撰写：

王禹偁	寇准	钱惟演	陈尧佐	潘阆	丁谓
林逋	杨亿	陈亚	夏竦	聂冠卿	李遵勗
范仲淹	沈邈	杨适	柳永	张先	

薛祥生撰写：

晏殊	滕宗谅	张昇	石延年	刘潜	李冠
谢绛	宋祁	贾昌朝	尹洙	梅尧臣	叶清臣
欧阳修	王琪	苏舜钦	韩琦	沈唐	杜安世
刘述	李师中	蔡挺	韩维	司马光	苏氏
刘敞	王安石	范纯仁	章燾	徐积	王安国
孙洙	韦骧	圆禅师	晏几道	王观	张舜民
魏夫人	王洸	陈济翁			

刘乃昌撰写：

苏轼

高洪奎撰写：

苏轼 仲殊 陈师道 张耒 侯蒙

倪志云撰写：

李之仪	陈慥	苏辙	舒氏	舒亶	孔平仲
刘泾	黄裳	王雱	黄大临	黄庭坚	晁端礼
曾肇	李元膺	朱服	刘弇	时彦	廖正一
秦观					

史克振撰写：

米芾 李甲 赵令畤

朱德才撰写：

贺 铸

刘银光撰写：

晁补之

序

在中国诗歌史上，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座高峰。经过七百多年，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还收录到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一万九千九百余首，残篇五百三十余；前几年孔凡礼先生编的《全宋词补辑》又补词人一百余家，补词四百三十余首。两者共收录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二万余首。这个数字与《全唐诗》相比，大约少了一半多。但是，宋词和唐诗一样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殊成就，都具有典范意义，都是人们所喜爱的。因此它不仅影响到元、明、清以至现当代，而且在世界诗歌领域中，它也越来越受到爱好、重视，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加拿大、美国、俄国、德国、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有介绍和研究，就是证明。

宋词是在唐五代词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南唐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宋词的发展、兴盛，还有它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我们知道，北宋建国以后，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结束了，虽然内忧外患并没有完全断绝，但是相对来说，国内局势基本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工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都市兴盛。如柳永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

去凤池夸。

概括地记述了当时杭州的秀丽景色和繁华富庶的景象。张先的《宴春台慢》：

丽日千门，紫烟双阙，琼林又报春回。殿阁风微，当时去燕还来。五侯池馆频开。探芳菲、走马天街。重帘人语，辘轳辘车，远近轻雷。雕觴霞滟，翠幕云飞，楚腰舞柳，官面妆梅。金猊夜暖，罗衣暗裊香煤。洞府人归，放笙歌、灯火楼台。下蓬莱，犹有花上月，清影徘徊。

则记下了当时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壮丽、繁华。南宋时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时汴京的繁华情况更是：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其他如成都、兴元（陕西南郑）、明州（浙江宁波）、广州等城市也是相当繁华的。这是宋词兴盛的基础。

其次，宋代最高统治者为了换得臣下的支持，采取“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宋制禄之厚》）的政策。宋太祖赵匡胤还希望权臣们“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邵氏闻见后录》）因此，宴饮歌舞之风盛极一时。就是获得“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京师民谣》）美誉的寇准，也是“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梦溪笔谈》）。又如丞相晏殊“未尝一日不燕饮”而且“必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这就促使应歌的宋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再其次，宋代的最高统治者大都洞晓音律，提倡作词。《宋史·乐志》称：“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谓：“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其他如真宗、神宗、徽宗、高宗，也都通晓音律，而且徽宗的词也写得很好。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加之，最高统

治者提倡作词，如宋祁作《鹧鸪天》（画毂雕鞍狭路逢），宋仁宗阅后即以官人赐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俞国宝作《风入松》（一春长费买花钱），宋高宗即日赐官（《武林旧事》）。这就更促使人们去学词，写词了。

可以说，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代社会又为宋词的发展注入了催化剂，因此，词在宋代有很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继唐诗之后构筑成了又一座辉煌灿烂的诗歌高峰。

宋词的发展可以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时期来谈。

北宋前期，首先出现在词坛上的是一些写景抒情的清丽小词，如王禹偁的《点绛唇》（雨恨云愁），寇准的《踏莎行》（春色将阑），潘阆的《酒泉子》（长忆钱塘），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等，但是他们的词作都不多。稍后的范仲淹的《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苏幕遮》（碧云天），也是情柔语丽的。后来在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抵御西夏侵扰的边塞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高旷的意境和悲壮的情调使词风为之一变，但仅此一首，并无影响。这时期词坛的领袖是晏殊和欧阳修。

晏殊（991—1055）是太平宰相，他的词清雅婉丽，内容主要是反映他富裕自得的生活，如“清歌妙舞，急管繁弦。榴花满酌觥船。人尽说、富贵又长年。”（《长生乐》）同时也反映了无名的怅惘，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踏莎行》）他的儿子晏几道的词和他齐名，词风也相近，但由于晏几道仕途失意，生活艰难，所以他的词表现了一种极度哀怨感伤的情调。

另一个词坛领袖欧阳修（1007—1072）也是达官贵人，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与晏殊基本相同，他也是一方面歌唱：“画船

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采桑子》）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倾吐了：“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蝶恋花》）的感伤。但是，话要说回来，欧阳修和晏殊又有所不同，欧阳修热心向民间词学习，因此，他的词取材比较广阔，既有男欢女爱，离愁别恨，也有描写自然风景的，如《采桑子》十首，有写风俗的，如《渔家傲》二十四首之类。就艺术风格来说，他除了和晏殊有相同之处外，还有疏隽明快的一面，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就曾说欧阳修词以“疏隽开子瞻”。可以说，从词的发展史来看，欧阳修的词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他的贡献无疑比晏殊要大得多。

和晏、欧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词人张先（990—1078），他的词极富韵味，有不少博得人们赞赏的佳句，如《一丛花令》结拍的“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天仙子》下片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柳永共同进入慢词的领域，他先后写了《山亭宴慢》、《少年游慢》、《谢池春慢》、《熙州慢》、《倾杯》等，这是晏殊、欧阳修词所未见的，是五代词风的一大转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对张先词有一段比较恰当的评论，他说：“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

打开宋词新局面的是柳永（983？—1053？），柳永的生卒年，迄今还没有定论，尤其是生年出入较大，唐圭璋定为987年（《柳永事迹新证》），林新樵定为984年（《柳永生年小议》），李国庭定为980年（《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我个人则认为从多种证据来判断，983年前后，应是比较可信的。

柳永由于政治上不得意，长期生活在乐工歌伎之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避暑录话》）。加之他又精通音

律，爱好民间音乐，因而也和乐工们创制了不少慢词词调，因此有人认为：“慢词当起于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永以失意无聊，流连坊曲，乃尽取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苏轼、秦观，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是慢词当始于柳氏矣。”（刘毓盘《词史》第四章）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慢词并不始于柳永，远在唐代的词里就已经出现了。例如现存于敦煌民间词中的《内家娇》和《倾杯乐》两个词调都在一百字以上，其他如杜牧的《八六子》也有八十九字，唐庄宗的歌头则长达一百三十六字之多。但是，从唐代到宋初，也就是张先、柳永之前，慢词并没有得到发展，词人们用得最多的是《忆江南》、《南乡子》、《浪淘沙》、《菩萨蛮》、《浣溪沙》等简短的词调，到张先、柳永才开始写慢词。而且，柳永不但大量写慢词，也创制了不少慢词词调，如旧曲新翻的《雨霖铃》，《法曲献仙音》。如自创新调的《戚氏》。如将简短的词调扩展为慢词词调的《长相思》。又如韦庄写的《女冠子》只有四十字，而柳永的《女冠子》则增为一百一十一字和一百一十四字两体等。根据上述，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慢词起于唐代。到宋代，经过张先、柳永的倡导，才得到发展。谈到此，或许有人会问：慢词为什么不和小令、中调同步发展，而要到张先、柳永时才得到发展呢？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是：小令、中调与绝句、律诗相近，唐五代人熟悉绝句、律诗，加之慢词曲长辞繁不易把握，因此，慢词没有和小令、中调同步发展。其次，小令、中调从唐五代到北宋初，已经是比较流行的了，民间的乐工、歌伎和词人们都要另辟蹊径。同时，经过许多词人的努力，长期的积累，写词的经验 and 技巧也丰富了，可以运用于慢词的创作了。所以，慢词到张先、柳永时才得到发展。

柳永极善于运用民间语言和铺叙手法来表达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反映都市繁华以及市民的生活面貌等，这不但扩大了

词的题材范围，也丰富了词的表现方法。冯煦说：“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累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郑文焯说：“屯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沈雄之魄，清劲之气，写绮丽之情，作挥绰之声。”（《大鹤山人词论》）夏敬观则说柳永词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手评〈乐章集〉》）。这些评价都是符合事实的。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戚氏》（晚秋天）、《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倾杯》（鹜落霜州）等作品，的确都具有上述的某些特色，都可以印证上述诸说的正确。

但是，这时期的词，不论是二晏、欧阳修，还是张先、柳永，一般来说，他们的词作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词的风格一般也是柔弱无力，很少例外。可以说，这时期的词坛基本还沉浸在浅斟低唱的软语声中。这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安石（1021—1086），他以改革家的气魄，在词的领域里，破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绮罗香泽的词风，用词来怀古如《桂枝香》（登临送目），咏史如《浪淘沙》（伊吕两衰翁），说理、谈禅如《南乡子》（嗟见世间人），写景、抒怀如《千秋岁引》（别馆寒砧）。所以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王安石词“一洗五代旧习”，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王安石仅只有寥寥二十余首词，虽然开了风气之先，但影响甚小。真正突破传统，革新宋词，使词面目一新，成就巨大，影响深远的是大词人苏轼。

苏轼（1036—1101）把词看作和传统的古近体诗一样的艺术形式，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在《与蔡景繁书》中又说：“颇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这就是说，他认为凡是用传统古近体诗的形式反映的广阔生活，都可以用词的形式来表达。词就是古代的长短句诗。所以元好问在《新轩乐府引》中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

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就苏轼现存的三百多首词来看，内容确实相当广泛。有抒发盼望为国杀敌，保卫边境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有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满庭芳》（蜗角虚名），有写农村风光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有表达对亡妻深挚感情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有表达兄弟之间友爱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有怀古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有说理的《无愁可解》（光景百年），有咏物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等等。正像刘熙载《艺概》说的：“东坡词都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的确，苏轼是用词来反映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这同时也说明，是苏轼把词从《花间集》以来专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狭窄天地里解放出来的，是苏轼给词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使它具有较前多得多的社会功能。

苏轼还改变了柔靡纤弱的词风，开创了豪放的新风格，为词的艺术开辟了一个新境界。虽然苏轼的豪放词并不多，只是少数，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此，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如吴世昌先生就认为：“（苏轼）除了写三百多首和‘花间’词人同样的作品外，又写了少许的和别的词人不同的作品”，但像《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大江东去）“只能说是旷达，连慷慨都谈不到，何况豪放。”（见1983年第九期《文史知识》载《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但这个意见缺少说服力。

和词的革新相适应，苏轼还突破了词在音乐方面所受的严重束缚。陆放翁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这就是说，苏轼写词是不愿意以内容来迁就声律的。这里要注意的是，苏词并不像有的人说的是不协律。苏轼的僚属赵令畤就说过：时人或谓苏词“于音律小不谐”（《侯鯖录》）。南宋的胡仔也说苏词“间有不入腔处，非尽

如此”（《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其次，词的内容的革新，必然导致词作为音乐附庸地位的改变。对此，南宋的王灼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

苏轼对词的革新，的确在宋词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胡寅在《酒边词》的序文里也曾说过：“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但是，当时词坛上的保守势力还是很强的，就连苏轼的门人也不都完全赞成他对词的革新，所以苏轼对词的革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北宋后期的词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是出自苏轼门下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轼影响的李之仪、贺铸等人。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跟苏轼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些词人，他们在政治上的观点基本相同，因此在新旧党争中，他们大都受到株连和打击。在词的创作上，他们则大都各具特色，甚至和苏轼走了不同的道路。

黄庭坚（1045—1105），他的词，早期是走柳永的道路，以浅俗的语言写艳词。后来在苏轼的影响下成为继承苏词，并进一步扩大苏词影响的词人。他的《念奴娇》（断虹霁雨），胡仔即评之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茗溪渔隐丛话》后集）。他的《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等词也都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他学苏词，以及对后世豪放词的影响。所以当时陈师道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见《后山诗话》）至于后世对黄庭坚词的一些责难，大都出自对豪放词的偏见。

在苏门词人中，秦观（1049—1100）是最被苏轼称赞的。但是，他并没有继承苏轼词风，而是博采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张炎评他的词是“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

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踏莎行》（雾失楼台）、《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鹊桥仙》（纤云弄巧）等就是他的代表作。

对于秦观词，冯煦说：“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排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说：“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而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白雨斋词话》）。他们都充分肯定了秦观词以及他在婉约词发展过程中的承前启后作用。这些评价应该说都是比较中肯的。

晁补之（1053—1110）的词颇近苏词，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内容，艺术表现选取更多的手法，特别是喜欢熔铸前人成句，扩展词的内涵。所以刘熙载说：“无咎词，堂庑特大。”（《艺概》）

李之仪（1038—1117）在《跋吴思道小词》中说：“（词）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齟齬”，又说：作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而且主张向晏殊、欧阳修学习。这明显是不同意苏轼对词的革新。他的词基本上就是遵循他的上述两条原则进行创作的。以《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最著名。

贺铸（1052—1125）一生屈居下僚，晚年退居吴下，闭门读书。现存词二百八十六阕，数量之多，仅次于苏轼。

贺铸词题材广泛，既有写离愁别恨的《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以及悼亡词《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又有写被压抑苦闷与不满的《小梅花》（缚虎手），表现报国无路的不平之气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贺铸的词风也多样，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贺铸词“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嫫、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这就是说，贺铸的词风具有盛丽、妖冶、幽洁、悲壮四种特色。贺铸词的

缺点是过度化用前人成句，用典太多，过于秾丽。陈廷焯说贺铸词：“除清真、白石两家外，莫敢与先生抗手。”（《云韶集》）评价失之过高。王国维说：“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人间词话删稿》）倒是比较确切的。

北宋后期词坛的领袖是被称为“集大成”的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21）深通音律，曾任替朝廷制礼作乐的大晟府提举。在词调的整理和创制上是有贡献的，宋末的张炎就曾说：“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词源》）。

周邦彦词受柳永词影响最大，他和柳永一样工于慢词，词的内容也多写男女之情，但言情体物更为精工巧丽、典雅含蓄，而且曲折变化多。如他的《六丑·蔷薇谢后作》即以结构谨严，曲折多变著称。又如《瑞龙吟》（章台路）、《兰陵王·柳》、《苏幕遮》（燎沉香）也是写得极精巧细密的。周邦彦不只是慢词写得很成功，小令也写得不错，如《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就写得十分精警动人。正由于此，所以历来受到许多人的称赞、效法。沈义父说：“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下字运意皆有法度。”（《乐府指迷》）陈廷焯也说：“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白雨斋词话》）而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认为：“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惟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而创意之才少耳。”指出周邦彦词在艺术上“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在创制词调上也是有成就的，但他的词存在“创意之才少”的重大缺点。应该说，这是对周邦彦词比较全面、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当时和周邦彦词风较接近的词人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

晁冲之、曹组、吕滨老、蔡伸等人。

综上所述，北宋前期词在初期是晚唐五代遗风的继续，至柳永一变，使慢词得到发展。苏轼对词的革新则是宋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北宋后期，周邦彦在提高词的艺术性以及词调的整理和创制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们对当时和后世词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

“靖康之难”，北宋在金兵的铁蹄下灭亡了。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进入了历史上的南宋时期。

南宋前期，词人们面对着亡国的悲惨现实，面对着民族遭受的巨大灾难，他们的词的内容和风格都有所变化。例如向子湮（1085—1152）就把自己的词分为“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后者多怀念故国、盼望恢复中原之作。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1084—1155?）的创作也是以“靖康之难”为分界线的。“靖康之难”前，她生活得很幸福，她这时期写的词的内容不外乎是夫妻间的爱情以及别离后的相思，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等，这些词语言清新、意境幽美、充满浪漫的情趣。“靖康之难”后，她和丈夫赵明诚到了江南。不久，赵明诚病死，她便独自一人过着流离漂泊的生活。这时期，她的词风变得凄苦、严肃。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作品，都表现了她国破家亡、感伤乱离的痛苦心情，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感动了当时和后世许许多多的读者。例如刘辰翁在他的《永遇乐》小序中就曾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对于李清照词，历来评价都很高，黄昇说：“使在衣冠之列，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徒擅名闺阁也。”（《花庵词选》）只有周济说：“闺秀词惟清照最优，究苦无骨。”（《介存斋论词杂著》）

和李清照同时代的叶梦得、朱敦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词人。叶梦得（1077—1148），他的词早期颇受贺铸影响，多

写个人闲情。“靖康之难”以后，转向苏轼学习，其《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水调歌头》（秋色将晚）等词，词风豪壮，内容多反映他的抗金主张和为国效力的志向。另一个词人朱敦儒（1081—1159）北宋时隐居洛阳，宋钦宗将他“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朱敦儒“固辞，还山”（见《宋史·朱敦儒传》）。“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他经淮西、江西，逃往岭南。后应宋高宗召到了临安（今杭州市），先后担任秘书省正字等职，被人指责为“专立异论”并与抗金派大臣李光相“交通”而罢官，退居浙江嘉兴。七年后被秦桧强迫他出任鸿胪少卿（赞礼官）。十余日后秦桧死，朱敦儒又被罢官，仍回到嘉兴隐居。

朱敦儒的词风，清逸处似苏轼，精丽处似周邦彦。他北宋时期的词作多写隐居生活，表示对功名富贵的蔑视。这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是《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靖康之难”后，他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词的内容和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作品都表现了沉痛的家国沦亡之感，表现了对国事的关怀，如《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临江仙》（直至凤凰城破后）等词作都是著名的。王鹏运称赞这些词是“忧时念乱，忠愤之致”（四印斋刊本《樵歌跋》）。

“靖康之难”使许多爱国志士在血和火中奋起。南宋前期的词人除了前面谈到的李清照、叶梦得、朱敦儒之外，有代表性的还有张元幹（1091—1161）和张孝祥（1132—1169）。他们用词来暴露、抨击侵略者和投降派的罪行，大声呼喊驱逐敌寇、收复中原。词风悲壮慷慨，充满了战斗精神。张元幹的《贺新郎》（曳杖危楼去）、《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都是具有深厚爱国思想的著名词作，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宋前期，还有一些抗金将相用词来表达他们坚决抗金，收复失地的决心，其中最著名的是李纲和岳飞。李纲（1083

—1140),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围攻东京,他谏止钦宗出走,又亲身督战,击退金兵,但不久即被罢官。南宋初被召为相,仍力主抗金复国,但不久又被罢斥。他的词如《喜迁莺·真宗幸澶渊》、《苏武令》(塞上风高)等,风格雄健,充满抗金的爱国激情。岳飞(1101—1141)是著名的抗金将领,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气势磅礴,音调激越,充满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恢复故国的坚定信念,千百年来激励着许许多多的爱国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之云:“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

对于《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千古名作,近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了质疑。当代夏承焘先生也认为余嘉锡的论据“都很有力量”(见《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并进一步论证这首《满江红》“是明代弘治年间人托拟之作”。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各抒己见,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岳飞的作品无疑。对此,我也认为岳飞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的著作权是应该肯定的。

南宋前期词坛领袖是辛弃疾(1140—1207)他一生以拯救祖国为己任,力主消灭入侵之敌,恢复中原,激烈反对和议,因此,一再遭到迫害,多次被贬官,而且先后罢官闲居上饶(今属江西)达二十年之久。残酷的现实,使他痛苦、愤怒,他把一腔忠愤都寄之于词。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的“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中的:“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等都表达了他迫切盼望为国出力而又得不到机会的悲愤。同时,辛弃疾还多次写词鼓励他的朋友们要为恢复中原作出贡献,他在送郑舜举被召时说:“闻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